



加速河套香港園區建設 探索「研發製造一體化」

新聞背後 卓銘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發布一周年。過去一年間，深圳園區不斷創新應用、改革創新、完善生態，向着「世界級科研樞紐」目標邁進。這提醒我們，香港園區的建設也要按下「加速鍵」，要貫徹落實「識變、應變、求變」的精神，實現經濟和產業轉型的突破。

《規劃》共提出了兩階段目標，包括到2025年，建立與香港及國際全面對接的科研管理制度，集聚一批香港及國際優勢學科重點實驗室集群和卓越研究中心、頂尖企業研發中心；以及到2035年，科技創新國際化程度居於全球領先地位，創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動，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創新載體和頂尖科技企業研發中心，成為世界級的科研樞紐。

現在距離第一個目標的期限還有不足4個月，華潤生命健康研究院、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際總部、聯合實驗室等三家國際科技創新機構，日前在河套深圳園區集中揭牌，無疑象徵着深圳園

區正逐步向着集聚香港及國際重點實驗室及研究中心等目標前進。其實香港園區在這方面的成果同樣不遑多讓，截至今年4月，港深創科園引入首批約60間合作企業，來自本地、內地、歐洲及北美等地區，預計投資超過數十億元，創造以千計就業機會，當中4成企業是首次落戶本港或擴充業務。

以時不我待態度推動改革

然而，深圳園區除了出多項措施招商引財之外，還實施了不少制度性改革措施，比如啟動「揭榜掛帥」重大技術需求徵集工作，推出選題徵集制、團隊揭榜制等五大科研管理創新機制，聚焦重大科研難題；還有設立「深圳市涉外涉港澳商事一站式多元解紛中心」、「河套國際商事調解中心」等機制，從諮詢、調解、仲裁、訴訟、公證形成「一站式」服務。

對比香港，現時香港園區首三座大樓要待今年底才告落成，新田科技城的首批創科企業及首批居民分別預計最早可在2030年前投入營運及在2031年遷入，港

鐵北環線主線更要到2034年才落成。屆時距離2035年第二個目標僅剩一年時間，香港要如何確保可以實現「創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動」，讓「科技創新國際化程度居於全球領先地位」？

2035年看似遙遠，但涉及制度機制改革等工作，特區政府在此時此刻就要以時不我待的態度加速推動。「改革」二字是三中全会的重點精神，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也不只一次強調香港必須「識變、應變、求變」。國家對河套發展抱有極大期望，香港必須從現在開始全力推進香港園區建設，更要有從體制機制上進行變革的決心。

深圳和香港園區，各有不同的資源與優勢，要發揮園區之間的協同效應，就要先把握香港的優勢所在。香港擁有的優勢，其實《規劃》本身已經說得很清楚：科技創新、金融開放；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實行自由港政策，擁有專業化的服務機構體系和高度開放的科研環境，科教資源豐富。去年10月，總部設在美國的聖諾醫藥，作為首批應引進辦之邀

來港擴展業務的企業之一，其首席財務官葉永基直言落戶香港的理由，就是因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背靠大灣區市場、有足夠的科研人才和土地，並表明來港目標之一就是要在河套區建立生產基地，將斥資4000萬至5000萬美元興建河套廠房，未來亦會考慮再斥資3000萬至4000萬美元加大在港的研發規模，並將研發基地由科學園搬遷至河套。

打造實現重大技術突破平台

一直以來，香港參與河套發展的思維都是先在香港進行一線科研轉化，再到深圳進行臨床試驗，進行產品註冊後，最後再於內地進行終端生產。簡而言之，仍然是傳統製造業的「前店後廠」式思維。然而，縱觀現時全球各地的高科技工業園區，無不將「研發製造一體化」視為發展的主要趨勢，比如美國硅谷，很多製造業企業自身也擁有實驗室，把技術研發、驗證及部分生產過程統一規管。換句話說，其實香港園區也未嘗不可包辦一部分實驗室的小規模製造工序，探索具有香港特色

的研發製造一體化。這樣做最大的好處，就是吸引更多不同類型的創科企業落戶香港。如果按以往的模式，香港永遠只做上游科研，本身就已經自我設限。而事實上，不少企業其實都有在香港建設生產基地的想法，比如上述的聖諾醫藥便是其中一個例子；也有內地生物醫藥企業表示，在香港進行藥物研發與在內地的成本沒有相差大遠，而且香港還擁有低稅制、資金自由出入、集聚全球國際高端人才等優勢，如果能推出更多有利研發製造一體化的政策，相信對不少海內外企業來說都是一個十分有吸引力的方案。再者，「香港製造」長年以來也享譽全球，這正是又一個擦亮香港「金字招牌」的好機會。

去年施政報告強調會把北部都會區對接河套合作區的發展定位，與香港科技競爭力的布局充分結合。河套區發展只爭朝夕，特區政府接下來必須以「改革」思維為核心，全面提速、提效、提量、提質，把河套區打造成為香港、為國家實現重大技術突破的重要平台。

善用普通法制度優勢 建構人工智能監管框架



法政新思 鄧凱

就在剛剛過去的6月，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以下簡稱「私隱公署」）發布了《人工智能（AI）：個人資料保障模範框架》（以下簡稱《模範框架》）。而在更早期的2月，私隱公署則完成了歷時近半年的人工智能合規檢查，對相關機構在部署人工智能系統提高業務效率時的風險和影響進行評估。

香港作為獨特的法律管轄區，或許因其技術市場規模相對較小，而難以在人工智能法律監管模式上引發諸如歐盟法案那般的關注度，但不可否認，香港的人工智能治理體系頗具特色，筆者願稱之為「軟法（soft law）治理示範」。結合系列專門性文件、核心思路以及底線義務等，本文將對香港的人工智能監管框架做出簡要評述。

香港的人工智能治理之所以是「軟法」式的，原因首先在於，自2018年以來，香港發布的多份數據科技類指導文件均不具有法律意義上的剛性約束力。2018年10月，私隱公署發表《中國香港的（數據）道德問責框架》，建議業界在運用數據科技時，應恪守「尊重」、「互惠」以及「公平」這三項數據管理價值。據此進一步衍生，私隱公署於2021年9月專門針對人工智能行業發布《開發及使用人工智能道德標準指引》，目的是協助產業持份者在遵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相關規定下建立合乎七項道德標準的人工智能，包括：問責、人為監督、透明度與可解釋性、數據私隱、公平、有益，以及可靠、穩健及安全。該指引同時附設「自我評估核對清單」以輔助當事方自我判斷上述道德標準的採納情況。

平衡新科技領域監管與發展

除私隱公署之外，本港另一個重要的科技部門亦即合併為「數字政策辦公室」前的「政府資訊科技總辦公室」，則在2023年8月制訂了一套更為完整的《人工智能道德框架》，旨在把人工智能的技術要求、應用標準等規範再度化約為成體系的道德價值與倫理原則。這些要素被主張嵌入人工智能的管治架構貫穿整個生命週期，

以及透過「應用影響評估」的手段來增強該框架的指引性和實操性。在細分領域中，香港金管局則在2019年底提出《應用人工智能的高層次原則》，將相關道德原則拆解細化為能在金融場景中實操的九項具體規定。

綜觀這一系列文件集合，多冠以「框架」、「指引」之名，從而首先示明其性質更接近於相對柔性的行政指導，政府的既定偏好與價值立場並非以強制干預及法定規限的方式做出。其次從表達上看，數據道德、合規倫理等宣言式美德或原則性道義構成了這些指導文件的主要敘述，「法化」(Juridification)規則及問責(Accountability)語言的弱化也是軟法的典型特徵所在。此外，企業、用戶等利益攸關方的角色訂明並不訴諸於「命令—控制」關係，而是平等合作者，例如《模範框架》中就設計了磋商交流、建立信任、形塑共識等措施。

作為一種現代規制工具，採用軟法治理的積極意義明顯。例如，它通常被視作某種既自由但又不乏公共理性的制度形態，這種較為平衡的自由式家長主義路徑自帶先驗的道德正當性。實施軟法所需的開放、協商、溝通等程序性價值能夠體現更多的「公共善」，進而有助於實現被規範對象的知情認同、自我約束，以及合作遵從。此外，軟法本身可以無意間改變環境或背景，並突出行業最佳實踐或慣例的顯著性，由此保持監管秩序的前後一致和結果可預測。

在普遍法理之外，軟法構建之於香港人工智能發展更是另有深意。香港長久以來都在推動創科事業上躊躇滿志，然而命運的齒輪卻多次空轉。從數碼港計劃開始，香港陸續錯過了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產業風口，直至現如今迎來了新一輪由大語言模型引領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浪潮。如何最大程度把握此次科技機遇，無疑也考驗着特區政府及相關治理者的施政智慧，也正是如此，軟法治理模式因其開放寬鬆與韌性包容而獲得了行業監管青睞。誠如前述金管局在《應用人工智能高層次原則》中就明確表示，過分規限或硬性的規定，或會窒礙人工智能相關科技向前發展。

務實地選擇軟法治理，充分說明監管者已然清醒地認識到，推動香港人工智能有所作為的非對稱性優勢，並不在於規模市場及其需求，而是

如何發展出一系列更符合自身科技產業發展利益的「錯位」監管思路與創新治理方法。更進一步，香港是否可利用其獨有的普通法思維體系來創製規則也值得想像。譬如對數據處理的必要性原則進行適度擴張解釋，以滿足人工智能合理利用個人信息的客觀技術需求；延伸至知識產權領域，相關的普通法法律構造也應包括承認生成式人工智能對著作權作品具有寬泛合理使用的正當性，亦或是在特定個案情境中探索豁免大模型訓練使用的版權侵權責任，等等。總之，以普通法因應技術和產業發展可視作香港向其他法域示範治理創新的有效選項。

為人工智能治理起示範作用

人是目的，而科技僅僅是手段，發展人工智能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儘管軟法治理意味着公共政策試圖以某種對產業包容，對技術「忍讓」的審慎、謙抑的姿態亮相，但絕不應偏廢、讓渡人本關照，根植人對機器的控制以及技術造福人類始終是人工智能治理的底線義務，也是應對人工智能信任危機的樸素方法。對此，《模範框架》借鑒了歐盟人工智能法中的風險分級分類模式，採取「風險為本」的管理方式，即視乎系統風險程度高低而採取相應的規制措施，其中也包括決定人為介入監督的程度。例如，針對那些可能對個體或群體造成嚴重及長期傷害並影響人類基本權利和自由（財務損失、身體傷害、歧視、信息自主權喪失等）的高風險系統，應適用「人在環中」(human-in-the-loop)的監管法則，旨在確保人類在決策中保留必要控制與主導，以防止自動化技術的出錯或不當決定。

科技發展在指數級加速，要不等一等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答案是肯定的，我們顯然已無法對人工智能加劇失業、挑戰社會公平和利益分配等未解難題裝視而不見。就在本文撰寫之時，「港版ChatGPT」悄然而至，並計劃在年內推廣至特區政府所有部門，既展現了香港創科實力，也是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好例證。相信在人機關係的規則維度上，面對全球性的人工智能治理赤字，香港亦能繼續完善軟法框架並創造示範，再次彰顯符合自身稟賦的制度競爭力。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與人權論壇研究員、法學博士

推動「總部經濟」引入優質企業



持平續論 朱兆麟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本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性，不亞於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兩者舉行之時，中國同樣面臨各種內外發展挑戰，面臨如何以改革推進國家全面發展的關鍵階段。正如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改革關頭勇者勝，我們將以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的決心，義無反顧推進改革」。在重要時刻作出正確抉擇，中國正大步走向光輝未來。

46年前，內地百廢待興，正值冷戰時期，國際環境動盪，外交形勢嚴峻。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中國改革開放之路，農村改革、國企改革陸續展開，包括推動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鼓勵民營經濟發展，亦吸引了許多外資企業進軍內地，帶來先進管理方式和技術，提升中國企業水平。

所謂「創業難、守業更難」，中國進一步改革面對的攻堅難關，包括高質量發展、科技創新，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當下全球經濟疫情後復甦力疲弱，而中國經濟的恢復速度在其中先拔頭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則對此持續推動所謂「去風險化」，不斷透過關稅、限制出口等措施，對我國作科技、貿易、金融以至輿論全面打壓，圖割裂中國與世界聯繫，以維持其霸權。

然而，中國一系列穩外資、促民營經濟的政策措施，包括縮減外商投資准入的負面清單，比如全面取消製造業外資准入限制，以及推進電信、醫療領域擴大開放，可見中國改革開放之路不會退縮，而且只會持續優化。

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具有里程碑式意義，對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意義重大。而在新一輪改革開放大浪潮中，香港的角色更加重要，香港各界應從各自的範疇，深入學習思考，以抓住機遇。未來尤其要做好「超級聯繫人」角色，扮演聯通內地與海外的窗口，把握當中湧現的機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為香港提供文化創造力、傳播力優勢；香港要保持東西文化薈萃國際化特色，向世界講好中國和香港故事。

近年特區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搶人才」、「搶企業」，增強吸納世界各地人才網絡，並促進內地與外國企業的人才、資金、技術交流。未來政府更要聚焦「十四五」規劃確立的香港「八大中心」定位，吸引相關企業、人才，發掘新增長點，推動創新科技、文化藝術等新興策略產業發展；持續推動「總部經濟」，吸引海內外公司到港設立總部或分部業務，為港引進優質企業，開拓國內國際雙循環帶來的機遇，既協助外國企業「引進來」，亦幫助內地企業「走出去」。

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英國騷亂背後的制度問題

國際觀察 宇文

英國一名17歲的男性嫌疑人持刀闖入一家幼兒舞蹈班，導致3名兒童死亡、多人受傷。有人造謠行兇者是極端伊斯蘭移民，從而導致蔓延英國多地的街頭騷亂。警方證實，行兇者出生於英國本土。其父是來自盧旺達的基督徒。然而，有人將行兇者刻意說成是穆斯林移民，顯然是故意挑動英國民眾對穆斯林移民的仇恨，故意製造事端。

移民成右翼分子遷怒對象

挑事者達到了目的。在首都倫敦，超過數千名抗議者在首相官邸附近和警方對峙，示威者甚至向首相官邸投放燃燒瓶等危險物。利物浦也有超過千名示威者和警方發生肢體衝突。英國的伊斯蘭建築和穆斯林群體也受到衝擊。隨著示威變成騷亂，英國各地出現了大規模打砸搶。分析者認為，這是13年來英國最大規模的騷亂。

英國《星期日郵報》將此視為「對國家的不信任已經像雜草一樣蔓延」。強調英國正經歷「不滿之夏」。美國企業家馬斯克毫不諱言「英國內戰不可避免」，包括澳洲在內的英聯邦國家則提請本國民眾不要前往英國，或者提醒在英公民注意安全。雖然剛剛執政的斯塔默政府稱只是「一小撮無腦的人」和「暴徒團夥」在推動街頭騷亂，但正是這「一小撮無腦的人」讓英國政府陷入被動顏面盡失。因為這場街頭騷亂，暴露了英國的系統性問題。

英國騷亂看似移民問題，實際上是英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民生矛盾疊加所致。經濟景氣周期，西方世界吸引移民從事白人自願從事的藍領工作，政府解決了勞動力短缺問題，移民獲得了移民西方的福利和工作機會，白人則享受更輕鬆待遇更好的工作。但是進入經濟衰退周期，英國社會矛盾激化，民生凋敝，民眾在詬病政府執政無能的時候，移民，尤其是伊斯蘭移民

就成為遷怒甚至是洩憤的對象。保守黨執政14年，先後經歷5任首相，經歷脫歐、疫情、高通脹等政治、經濟、民生全方位的動盪，英國人陷入痛苦煎熬中，英國社會宛然是一座即將爆發的憤怒火山，此時突發的「移民二代行兇案」就成了火山爆發的導火索，變成英國人發洩憤怒和不滿的由頭。因此，英國街頭騷亂的元兇不是移民矛盾，而是英國政治經濟社會矛盾系統性疊加積累所致。

從街頭騷亂的開始、蔓延、激化，英國極右翼勢力都參與其中。從謠傳穆斯林移民殺害英國兒童開始，英國極右翼分子就充分利用族群對立、宗教衝突、虛假信息和口水戰等刻意製造社會混亂，甚至是誤導英國民眾用以暴易暴的方式將街頭示威升級為街頭騷亂。因此，英國騷亂並非英國首相斯塔默所稱，只是由「一小撮無腦的人」和「暴徒團夥」作為推動目前暴力事件的幕後黑手，而是英國極右翼勢力

全程參與其中的政治事件。

在歐洲政治整體「右轉」的大形勢下，「脫歐」的英國難以擺脫右翼勢力的突襲。只不過，從歐洲議會選舉到德國、法國的右翼崛起，歐盟主要大國的右翼勢力尚未脫離民主體制和法治軌道，但是英國工黨雖然在大選中獲勝，英國右翼卻對斯塔默政府反將一軍，這不僅意味着英國政治體制的混亂，也凸顯英國民主體制的失效。

支持黑暴卻全力鎮壓示威者

當年卡梅倫的脫歐公投是因為英國民眾反對接納中東移民，隨後保守黨政府的移民政策也相當保守，蘇納克時期甚至要將移民遷往非洲盧旺達。因此，相比其他歐洲國家，英國移民數量算是少的。在法國都是移民不滿社會待遇而挑起街頭騷亂，在英國卻是極右翼分子通過編造虛假信息就能挑起針對穆斯林移民的街頭騷亂，凸顯英國的問題不在移民，而在自身。英國

患上是一種孤立主義的不治之症，把移民當成替罪羊和出氣筒，但即使把移民當作眾矢之的，最終也救不了英國，只會讓英國更爛。

英國街頭騷亂對英國政府也是強烈諷刺。一方面，英國政府的表態有着濃郁的雙標意味，當年香港發生黑暴，英國政府叫得最歡，假做支持香港黑暴分子，給一小撮黑暴分子提供政治庇護。到了英國街頭騷亂，英國政府卻是另一副嘴臉，動用「全部法律力量」對示威者進行鎮壓。另一方面，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習慣通過支持其他地方的反政府勢力，並利用自媒體和虛假信息煽動街頭運動，通過「顏色革命」的方式顛覆他國政權，當下英國的極右翼勢力依樣學樣在英國製造街頭騷亂，也有複製「顏色革命」的趨勢。對英國政府而言，這也算是玩火自焚吧。

英國街頭騷亂，不是移民惹的禍，都是英國自己的錯。國際關係學者